



“没有头衔的外交家”

1933年11月,23岁的乔治·海德姆来到上海,那时他刚刚从瑞士日内瓦医学院毕业并取得博士学位。1936年夏天,海德姆、斯诺赶到安塞县白家坪陕北红军前敌指挥部。7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并给他们拟订了一张考察日程表。通过一个星期的采访和考察,陕北军民在物质上的贫乏与精神上的充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令海德姆觉得这里好像是中国大地上生长的另一片新大陆,是一个新的世界。一个月后,他决定留下来,为红军服务,并为自己取了中文名“马海德”。不久,马海德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卫生部顾问,成了第一个扎根根据地献身中国革命的外国医生。1937年2月10日,马海德经吴亮平、张浩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红军接受改编后,马海德穿上八路军军装,随朱德率领的八路军总部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在山西五台山开展战地医疗。1937年底,马海德奉命调回延安筹建八路军军医院。在延安,马海德和八路军战士、边区群众一起劳动,使延安有了第一所能够收容300多名伤病员的正规军队医院。1939年,为纪念白求恩,这所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以此为总医院,几年中,在马海德的指导下,先后建立了8所中心医院,24所分院,形成总计约1.18万张床位的抗日根据地医疗网。

马海德不仅是医生,而且还担任了中央外事组的顾问,成了一位

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38年春天,马海德作为八路军的代表,陪同加拿大著名外科医生白求恩率领的加美援华医疗队前往抗日前线,做向导,当助手和翻译。1939年,他又参与接待了爱德华、巴苏华和柯棣华组成的印度医生援华医疗队,德国医生汉斯·米勒和著名记者史沫特莱、海伦·斯诺、贝特兰以及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官卡尔逊。马海德以自己的经历向他们介绍了中共抗日根据地的状况以及方针、政策。1944年,马海德又作为中共的代表,参与接待了美军观察组,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对美政策。1946年,他作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医疗顾问到国统区执行任务,同时奉周恩来的指示以解放区救济总署顾问的身份,配合中共代表向世界揭露国民党企图打内战炸毁黄河大堤的阴谋。他还及时向宋庆龄报告了国民党官员将大量的救济物资中饱私囊的事实。国民党的丑行暴露以后,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联合国600多名工作人员联名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正因为有以上成就,马海德赢得了“没有头衔的外交家”的美誉。

1949年10月1日这一天对马海德来说,更多了一份喜悦和激动——他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申请获得批准。周恩来亲笔签名的中国国籍证书,使马海德成为第一个加入新中国国籍的外国人。

来源:北京日报

课本里的吴伯箫

大约两年前,镇江的一位文友告诉我,他从正在读初中的女儿的《语文》课本上看到了吴伯箫先生的《灯笼》,向我了解其中某个词的含义。《灯笼》是吴伯箫早期的散文,收在抗战时期出版的《羽书》里,对此我本不陌生,但这篇散文被选入《语文》课本,让我有种既亲切又新鲜的感觉。

说到《灯笼》,故事可真不少。其一,《灯笼》里写了吴伯箫小时候在家乡与灯笼有关的往事,譬如和长工李五打着灯笼到村外迎接晚归的祖父,又譬如他上“灯学”专用的“小纱灯”以及他喜欢“用朱红在纱灯上描宋体字”。其二,写《灯笼》的时候,吴伯箫已经到济南北郊的一所乡村师范学校教书,那时他仍喜欢写散文。《灯笼》写出后,在天津《益世报》编副刊的文友向吴伯箫约稿,故《灯笼》首先在《益世报》的副刊“益世小品”上发表,时间是1935年11月。其三,《灯笼》发表后,吴伯箫把剪贴的发表稿和别的作品拢在一起,准备编个集子,在抗战全面爆发那年托付给老作家王统照先生。王统照将书稿带到上海,代吴伯箫取了个书名《羽书》,由巴金先生收到他编的一套丛书内公开出版,时间是1941年。那时,吴伯箫远在延安,对此事一点儿也不知晓。其四,1942年,山东有个无名文人把这篇散文改题为《灯笼篇》,署上他自己的名字寄给北京的《吾

友》杂志,竟又公开“发表”!其五,《灯笼篇》“发表”后,被北京一个十多岁的少年读到,他一下就被文章“那浓郁的乡风诗情”吸引了。可没过多久,他又看到《吾友》上的读者来信,揭发《灯笼篇》是从吴伯箫的《羽书》里剽窃的,接着杂志社也发表启事,公开了这起文章剽窃案……

那个被《灯笼篇》,也就是吴伯箫的《灯笼》一文深深吸引的少年,就是后来的著名诗人邵燕祥。

今天的初中生一定不知道除了《灯笼》,吴伯箫还曾有不少散文被选入不同年代的《语文》课本。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语文》课本里就陆续收入吴伯箫写的《记一辆纺车》《歌声》《菜园小记》《难老泉》《“早”》。其实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吴伯箫写南泥湾的散文就被选入解放区的《中等国文》课本了。

吴伯箫先生从上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散文写作,一生不辍,是现代散文名家。他先后出版过《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出发集》、《烟尘集》、《北极星》和《忘年》等散文集,还把德国诗人海涅的诗集《波罗的海》从英文转译为中文。他的散文富有激情,昂扬向上,又特别讲究布局谋篇和字句的推敲,在富丽多姿中保有一份内在的质朴,既充满诗意,又清俊蕴藉,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

来源:北京晚报



徐悲鸿 《猫》

徐悲鸿画猫调侃徐志摩

吵得不可开交,但友情依旧——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画家徐悲鸿和诗人徐志摩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围绕是否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画家作品的话题,展开了一场“针尖对麦芒”的论争。此后,徐悲鸿又由徐志摩的爱猫之癖,挥毫作画,题跋调侃,演绎了一段不失温情的艺坛雅事。

1929年4月10日至3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在上海举办“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规模空前宏大,入选者549人,展出作品1200件,特约作者342人,展出作品1328件,包括传统书画、西洋油画、雕塑、工艺品等。徐悲鸿、徐志摩、林风眠、刘海粟、吴湖帆等7人联袂担任展览会总务常务委员,作为美展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徐志摩还和陈小蝶、杨清馨、李祖韩负责编辑出版《美展特刊》(三日刊),他在发刊词《美展弁言》中说:“我们留心看着吧,从一时代的文艺创作得来的消息是不能错误的。”然而,徐悲鸿却旗帜鲜明地主张写实主义风格,极力否定西方现代主义画派,坚决反对将他们的作品引入美展,甚至以“不在沪任职,活动不便”为由,拒绝送展自己的画作。

数日后,徐悲鸿致信徐志摩,就西方现代主义油画的“真伪”和“是非”问题,以“庸”“俗”“浮”“劣”等字眼,将马奈、雷诺阿、塞尚、马蒂斯等画家的作品讥讽为“无耻之作”,负气地表示:“在我徐悲鸿个人,却将披发下山,不愿再见此类卑鄙昏聩黑暗堕落也。”

徐志摩收到徐悲鸿的书信后,以《感——致徐志摩公开信》为题,将它全文刊登在4月22日《美展特刊》第5期上。他有感而发,写下长达7000字的《我也“感”——与徐悲鸿先生书》,在第5、6期上连载,予以回应。

徐志摩认为徐悲鸿对

现代主义画家及其作品的谩骂过于“言重”,艺术品评的态度应更冷静、理智,指出现代派画风有其自身魅力,为中国画家效仿是必然的倾向。三天后,徐志摩给远在欧洲的好友刘海粟写信,谈及“我与悲鸿打架一文,或可引起留法艺术诸君辩论兴味”,“悲鸿经此,恐有些哭笑为难。他其实太过,老气横秋,遂谓天下无人也。”

面对徐志摩的批评,徐悲鸿坚持己见,又相继写下《“感”之不解》《“感”之不解》(续),刊登在5月4日《美展特刊》第9期及中旬出版的增刊上,重申了自己笃信写现实主义的艺术立场。徐志摩又洋洋洒洒写下六七千字的文章,因版面有限,最终没有发表。

徐悲鸿和徐志摩在“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会”期间灵光乍现的笔战,被称为“二徐论争”,是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次重要的观念对垒。由于艺术立场不同,尽管徐悲鸿和徐志摩意见不合,争执激烈,但只限于文艺批评范畴,不带有身攻击,且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在旅欧期间结下的友情。

徐志摩在生活中是爱猫一族,这年初冬,徐悲鸿画了一幅《猫》,笔墨细腻,形象生动,赠送给徐志摩。画面上,一猫黑白相间,横行在粗壮的树干上,双目圆睁,侧首观望,足下是斜逸而出的数枝早梅。画的右上方题款:“志摩多所恋爱,今乃及猫。鄙人写邻家黑白猫与之,而去其爪,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后钤印“东海王孙”,左、右下角则分别盖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和“荒谬绝伦”的章。题款寥寥32个字,却意含隐喻,耐人寻味。

其中,“今乃及猫”,以猫指代生性浪漫的诗人的旧爱新欢。“去其爪”,意指一年前的美术之争,表明自己始终坚持写实主义主张,坚定不移地改良中国传统绘画。“自夸其于友道忠也”,包含了一段往事:徐志摩同军事学家蒋百里都是梁启超的弟子,彼此关系亲密。1929年冬,蒋百里因弟子唐生智起兵讨伐蒋介石,第二年3月受牵连而入狱,徐志摩赶赴南京,陪友坐牢,徐悲鸿以此称许徐志摩珍惜友情的忠诚品质。

1931年春夏,徐悲鸿为徐志摩的夫人陆小曼创作了一幅半身素描。1935年冬,徐悲鸿又借胡适家中豢养的“狮子猫”,作画缅怀故友,并题跋:“甲戌仲冬,怀亡友志摩之友,忆摹其容,不识其在龙钟或婆娑之态,视昔奚若也。”

来源:北京青年报